

诚信积分:以“诚”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基于荣成市乡村振兴政策的思考

周海宁,张 翥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始终坚持人本位的立场。以信用积分制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既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多方参与以及上下互动特性,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式的法治、德治以及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农村诚信积分制度的建设与推广激发了农村公共之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一场以善制与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实践。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信用体系;善治;诚信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1-0035-07

一、序论

(一)“诚信”的制度规范性价值

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设定为“三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步,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同年9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第七篇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中指出“倡导诚信道德的规范”,具体来说“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观念。”^[2]

从乡村振兴的第一步战略的成果来看,在制度层面上,2016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其宗旨在于“弘扬诚信传统美德,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营造优良信用环境。”其

中,第六条提出了“完善个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3],旨在为信用优良的个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便利,对应地对信用失信的个人实施联合惩戒。2018年5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方案》等文件,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办法。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指导意见》及山东省具体实施措施基础之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济南市个人诚信积分管理办法(试行)》于2020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明确个人诚信积分可享受多项“信用惠民”激励,以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人,可以享受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程序简化等便民服务,还可在市公共图书馆享受借阅免押金、借阅期延长、借阅册数增加等服务^[4]。

山东省荣成市(县级市)于2012年起开始进行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实践,以“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为导向,探索建构社会征信管理体系,目的是将诚信建设从单纯的道德引导层面,提升为兼顾制度保障层面,从而实现以软性道德约束与刚性的制度规范来引导大众的社会行为^[5]。荣成市获批创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收稿日期:2021-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媒体对农政策传播效果评估与跟踪研究”(19BXW073);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社交电商扶贫现状与对策研究”(2019RKB01388)

作者简介:周海宁(1985—),男,山东荣成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张翥(1988—),女,辽宁庄河人,文学硕士,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示范城市,成为山东省唯一、全国仅有的3个县级创建示范城市之一^[6]。2018年1月,荣成市获得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称号^[7]。在荣成市,“诚信建设”成为其创建文明城市的“名片”,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体都拥有自己的“信用档案”以及“诚信名片”^[8]。

由此可见,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设定以及实践中,诚信体系的建设在乡村秩序建构之中完全可以发挥其特有的功用。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已经步入第二阶段,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15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根据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城市与农村发展的重心往往不同,城市偏向于经济增长极,农村偏向于发展稳定器^[9]。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要讲求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城市与乡村并非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此,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乡村社会的振兴便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到日程上来,因为美丽中国的建设不能没有美丽乡村来加持。

从个体内在道德自律到法律的外在制度约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但是所谓的良好法律也不仅仅是一件制度外衣,而是一种“文化与制度的良性耦合”^[10]。换言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依赖传统文化的内在自省、自觉、反思以及外在制度性的约束性所建构的制度性框架可能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统合方式。所以,对“诚信”现代性的实践考察除了对其制度性、规范性进行分析之外,“诚信”作为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伦理的重要范畴,就必须对其思想的价值内涵进行相应的挖掘。

(二)“诚”思想的价值内涵

“诚”作为传统经典《中庸》的重要范畴之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11]36}对此,朱熹注解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1]36}朱熹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诚”是天道的实然性,其本质是“真实无妄”。“诚之者”则表现为“择善固执”,是人道的“应然性”,是人后天选择的结果。由此,天道与人道相关联。孟子亦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1]《离娄上》332},再次肯定了“诚”是天道与人道

的合一。

《中庸》开篇纲领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20}指的是性是天所赋予的,而人遵循天所赋予之性则称之为道,遵循道而行修身之事则是教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天人合一”的理论源头之一,强调了个人对天道“诚”的追寻,以及通过“诚之者”强化自身修养、加强道德水准和规范性的要求。《中庸》再次强调了“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1]37},指的是自然地由诚而明白道理这是天性使然,而通过明白了道理而理解了诚则是后天教化之功,这边从本体论角度强调了“诚”是人性自觉的本质与来源^{[12]137}。

与“诚”相关的范畴在传统文化之中还有“信”“忠”等。其中,诚与信往往呈现一种等价的关系。《说文解字》曰:“诚,信也。”^{[13]92}从个人自律、修养的角度出发,强调诚信之于个人的重要价值,“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1]69}。从“忠与信”的角度强调其等价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之中“诚”“信”“忠”皆是通过规定认知价值范畴从而规范日常行为,特别是论语中指出孔子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1]83-84}朱熹进一步总结这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11]83-84}。这进一步确信了传统文化将“诚”相关的范畴是从个体自省的角度规范个人认知价值取向的。

综上,传统文化之中,个人诚信价值的确立是建立在个体道德自律、自觉的基础之上的,道德内化的工夫完全是取决于该伦理道德接受者自身的自律性与自觉性。所以“诚”作为追求至善的人格价值,是由个体内在的道德感来自律而指导实践行为的,是古代通过“心灵”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政治或者法律的外部强制性保证实施。然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诚信体系的建构已经不是单纯发挥诚信的内在自觉、自律性或者外在的政策、规范性功用,而是结合消费主义社会、媒介化社会等特点,将诚信与“信用有价”的认知、与网络社会的媒介文化转型相契合而建构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新探索。所以从乡村“诚信”体系建构

以及社会治理的背景入手分析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探讨山东省荣成市以“诚信积分”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探索,可以得出有益启示并对其进行反思、探讨。

二、建构乡村“诚信”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行细化,号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直指民族复兴愿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4]。其中,第一个“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百年”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2049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目前来看,城市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战略都是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在现代化进行的过程中,以科学理性为手段,以经济繁荣为目标,城乡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但是,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就成为绕不开的关键。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难点具有普遍性。具体而言,就是要克服工具理性、公共文化式微、本土文化内生机制弱化、乡村自治能力滞后、共同体意识不强等问题。这也体现出通过乡村“诚信”体系建构来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工具理性影响,乡村主体情绪感低落

工具理性的关键在于“计算”,不关心目的,只关系达成目的的手段是否是最优的^[15]⁴⁹。工具理性是以功利性为特点,是针对特定的目标,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获得最大或者最优价值的手段。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在于“农民的自觉”,因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16]⁶¹⁸。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二元格局对乡村主体的幸福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城市化加快了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乡村亚文化的“收编”进程,导致了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再次,城市工业文明的崛起,冲击着农村熟人社会传统人情关系,从而导致其衰落。由此,乡村主体呈现出“物化人格抬头”“功利人格显现”“集体观念淡薄”的倾向^[17]。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由物资

匮乏时代转为物质富足时代,一些农民亦追随时代潮流,以工具性的理性主义为人生价值标准,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人之为人的标准由德性转变由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18]。于是,为应对城乡二元差距的扩大,农民离开熟人社会进入工业化大都市成为“农民工”,这导致农村社会“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村庄空心化”等现象的出现。对于农民来说,一方面是代表着“人生成就”的城市“财富梦”,一方面是代表着“根与文化”的“地方情”,在两相取舍之后,作为乡村主体农民的个体进取心就会大大降低。

(二)公共文化式微,本土文化内生机制弱化

公共文化本来是通过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以公共性为机制规范和实践准则,以公共利益的满足为主要内容,以公共领域为探讨场域,以认同、共识为目标和效果而实现其文化建构的^[19]。但是在“乡土中国”^[20]¹中,社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土地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流动性差、安土重迁且具有封闭性的村落社会,熟悉且信任度高的熟人社会,重规矩轻契约的礼俗社会。但是现代乡村发生的社会变革给农村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21]¹。由于本土文化内生机制弱化,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在生产力解放之后,大多以不健康的娱乐活动替代公共文化的缺位。而以先前乡村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注重文化的“移入”,缺少对本土内生文化的“培育”^[22]。过去公共文化由于是政府主导从“外部”植入,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力度弱,无法唤起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热情,于是造成乡村公共文化式微以及内生本土文化弱位的局面。

(三)乡村自治能力滞后,共同体意识不强

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和宗族是维系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成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自治”由理念变为现实。1982年我国修订的《宪法》第111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于是,村民们开启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四个民主”时代。村委会的设置体现了制度层面的改革。但是由于承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削弱了村委会的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妨

碍了村委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23]。由于乡村自治能力的滞后,还可能导致农村农民离散化现象的出现。农村农民离散化的原因可归结为:村自治组织运转经费不足;村干部的可信任感降低;农民收入来源以及价值观念多元化等^[24]。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影响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民的共同富裕。

三、荣成市的信用积分制: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荣成市是威海市辖县级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统摄三区(荣成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辖12个镇、10个街道、790个行政村、51个社区居委会,户籍人口66万人、常住人口71万人,陆地面积1526平方公里,海岸线487公里。从2012年起,自山东荣成市开始进行诚信建设探索实践以来,征信管理与村规民约融合,将道德引领与制度保障并举,乡村秩序治理的新模式逐渐走向成熟。

传统社会治理是一种单向性社会统合模式,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以及农民主体意识的提高,过去那种单方向地进行议程设定的治理模式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共建、共治、共享的政府、社会、民众“三位一体”互相协力的乡村治理模式开始发挥作用。山东荣成市以积分制为导向的信用征集模式,正是以政府为上位主体、社会为中位主体、以民众为本位主体所施行的征信、评价运行机制。积分制度以政策、规范为保障,以民众自觉为根本,以社会联动为必要条件,共同创建美丽新家乡、培育美好的“地方情”、实现美妙的“中国梦”。

(一)上位政府主体搭建信用管理系统,“顶层设计”覆盖所有主体

荣成市通过编制《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目录》来量化守信行为和失信行为,并为其赋予相应的分值。在此基础上推出“政务信用评级”,实行千分制考核,并根据得分值高低划分出六个等级。从AAA到D级分别为信用结果提供判断标准,如此初步实现“社会治理信用化、信用管理社会化”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上,社会治理上位主体——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搭建“三网四库”征信管理系统,实现对征信对象和征信主体的全覆盖,所有行

业领域均纳入管理范畴,所有诚信积分对象(个人和组织)均有“诚信档案”和“诚信名片”,征信内容涉及所有社会经济活动。这里的“三网”,其一是以电子政务网为中心的“公共征信网”,实现荣成市142个单位部门联网、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其二是以统一信用信息平台为中心的“基层征信网”,通过实现市、组织行业、村居征信来建设平台、网状管理;其三是互联网平台为中心建构“信用荣成网”,对接上级官方信用网站。“四库”面向自然人、村居组织、社会法人、党政机关建立的四个信息数据库,分别是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身份标识的自然人信息数据库、以行政区划代码为地理标识的村居组织信用数据库、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群体标识的社会法人和党政机关信用信息数据库。如此可见,荣成的信用管理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分别管理,并体现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各方面产生正向的刺激作用。

(二)中位组织化主体助力乡村振兴

中位主体指的是处于中间位的组织化主体,区别于上位主体的政府以及本位主体乡民个体,其发挥的是作为中介的联动作用。由于乡村振兴政策的吸引,诚信乡村建设下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互网络所提供的交往平台(微信群等)的助力下,村民在村“共同体”的引领下逐渐出现回归“熟人社会”的趋势。

东岛刘家村是荣成市王连街道下辖的行政村,现有386户村民、党员35人,先后获得威海市级文明村、荣成市文明建设示范村居、荣成市诚信示范村居、石岛管理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称号。现任村书记2011年上任,已逾10载,曾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利用村庄现有优势,充分挖掘周边八河港水库沿岸风光优美的潜力,在成片土地流转后带领村民走上“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的旅游”发展之路。近年来社会企业如赤山集团投资2000万,双利集团投资3000万为村庄改造助力。村民积极参与诚信建设,加入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即“志愿+服务”的组织模式。其中设立服务组织14个,如美厨娘、鼓乐坊、利民社、巧工匠、跑个腿、文曲星、菜篮子、洗衣社等。同时,设立文明实践基地为服务志愿者们提供场所,如文化活动广场、诚信长廊、爱心农场、暖心食堂、诚信共享屋……村里还设有微信群总群和志愿服务者按区分组的微

信分群,能够满足村民日常的沟通以及志愿服务活动时的迅速召集以及任务分配需求。

外部企业入村助力乡村建设,增强了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潜力,为农民工以及外出学习、工作的青年的“返乡流”增加了砝码。正如一村民所说:“我们村再过30年也不会空的,这么漂亮,肯定会有很多人都回来居住的。”这是在以村集体为中心的共同体意识强化的前提下,村民个人对乡村未来发展前景的肯定。而且,由东岛刘家村的个例来看,村居的组织化管理,各个团体组织的形成,为村民的信用实践提供了“场域”,而微信群等社交媒体群的创建又为村民多元群体的“共同在场”提供了平台保证。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社交媒体为中心的“互联网自组织”“虚拟合作网络”平台组织,有助于乡民的“发声”,改变以往单方向的被动式信息接受,为村民们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三)本位主体村民的参与式诚信实践提升个体幸福感、共筑美丽乡村的未来

荣成市荫子镇头甲村乡村夜校开讲,村民王某说:“以前晚上没事去打牌,现在吃完饭就来夜校‘抢座’”。东岛刘家村的村民刘某描绘了这样一个如“桃花源”般的“东岛村民刘老头的一天”:早上起来围绕着村子晨练,上午将衣服送到洗衣社,然后去巧工匠剪个头,中午到“爱心食堂”吃个饭,下午到去志愿者那里做个推拿,傍晚在村里“青山绿水”间散步。

诚信积分的推行,使村民积极参与到服务活动中来,通过服务活动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内在德行的升华,而且带来实际的“价值”。农村志愿者作为本位主体广泛参与到环境整治和村庄治理等工作中,有效降低了村集体的支出。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说:“原本10万元也拿不下的‘暖心食堂’,从2018年11月运行至今,不但没花村集体一分钱,还结余了1.5万元”^[25]。东岛刘家村,村民参与诚信志愿者活动所挣取的积分,不但可以抵销水电暖等费用支出,还可以抵销外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支出。同时,村集体还在积极探索社区养老的新模式,届时“积分换养老”等措施也将会实施,“谁都会有老的一天”,这也会激励大家更加踊跃地参与到诚信志愿者活动中来。

诚信积分制度的推广极大刺激了村民本位

主体参加村集体公共生产活动,一方面激活了农村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助推了乡村基层治理工作。对于村民个人而言,这也极大提升了个人幸福感:既对当下的个体存在感有所提高,同时亦强化了自身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信心。诚信积分的实行让社会有了温度,让村民们有了期盼。

四、荣成市乡村治理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并指出其核心内容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构^[26]。由此可见,在乡村振兴过程之中展开信用体系的建设可谓正逢其时。而荣成所展开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新探索,说明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善治”不仅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同时有助于社会调节,还可发挥乡民自治功能,是“政社民”三方协力互动的治理模式典范。以诚信积分为中心的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了“政社民”新型乡村秩序建设的进程,体现了自治活力、法治秩序以及德治精神的融合,是社会善治的有效路径。荣成市所探索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合一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始终坚持人的本位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明确了“谁来治理、为谁治理”的问题。荣成市通过“诚信积分”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心灵治理与外部激励相结合的范式,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一提供了契机,犹如为现实安插上理性的翅膀,既保障了经济效益的最优化,又确保了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

(二)发挥新媒介的功效,强化共同体意识

进入新媒介文化时代,社交媒介的普及化使传统的“熟人社会”的交往机制也发生改变:传统习俗如村民们共聚在村广场闲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荣成的“诚信+志愿者”活动却使整个村落又活跃、生动了起来。虽然在志愿服务之外,大家依旧为生活而辛勤劳作,但是村民通过社交媒介所建构了共同交流场域——微信群等,进行着一种全新的沟通交流。通过个体间的交流,媒介的赋权功能,不但使村民个体

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而且与乡村之外的即时互动交流亦成为可能。于是,信息的日常分享促进了公共交往的扩大化;意见的共享、决策的参与借助着媒介的“在场”功能而得以实现。由此,共同体意识借助着社交媒介的凝聚作用而得以强化。

(三)坚持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兼顾公共之善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两个核心词汇是“制度”与“治理”,其关涉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把握“制”与“治”的逻辑关系,而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制度优势向善治的转变,即“善制”向“善治”的转变^[27]。“善制”表现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并能接受实践的检验,验证其合理性。如荣成市建构“诚信治理体系”,就可以看作是“善制”的体现。但是“善制”是否就是“善治”呢?则需要界定“善治”的标准。学者虞崇胜将“善治”归纳为三点:一是治理主体多元;二是管理过程兼容多方参与以及上下互动;三是治理手段与方式的多元^[27],现代化的治理方式表现为法治、德治与自治的相结合^[28]。但是,“善治”还应包含两个关键点:一是激发人的善念;二是让参与者有更多获得感,即主观幸福感变强^[29]。由此可以总结出,“善治”的目标在于正确认识人的位置,将人作为治理的目标而非手段,从而达到公共之善。

总之,荣成市积极建构的乡村信用体系是“善制”的一次有效探索,是以基层社会的“善治”为目标而进行的社会治理的积极实践,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深化与拓展,因此值得对其进行深度研究以及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A/OL]. (2018-02-05) [2021-06-30]. http://www.moa.gov.cn/ztlz/yhwj2018/spbd/201802/t20180205_6136480.htm.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A/OL]. (2018-09-26) [2021-06-30]. 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09/t20180926_6159028.htm.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98号)[A/OL]. (2016-12-30) [2021-06-3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

-12/30/content_5154830.htm.

[4]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个人诚信积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A/OL]. (2020-09-08) [2021-06-30]. http://www.jinan.gov.cn/art/2020/9/8/art_2610_4615206.html.

[5] 山东荣成:一座城市的诚信实践[EB/OL]. (2015-11-15) [2021-06-03]. http://zqb.cyol.com/html/2015-11/15/nw.D110000zgqnb_20151115_9-02.htm.

[6] 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荣成模式”[EB/OL]. (2017-07-04) [2021-06-03]. <https://www.fx361.com/page/2017/0704/1978006.shtml>.

[7] 威海、荣成入选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EB/OL]. (2018-01-09) [2021-06-0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9104785388801704&wfr=spider&for=pc>.

[8] 周叠瑶. 荣成市:以诚信为荣[J]. 小康, 2019(19).

[9] 贺雪峰. 宅基地、乡村振兴与城市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10] 伊涛. 文化与制度的耦合:见义勇为的儒学表达与法律助推[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8).

[1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1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三联书店, 2008.

[13] 许慎. 说文解字[M]. 段玉裁, 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4] 从“三步走”到中国梦[EB/OL]. (2015-03-22) [2021-07-01]. 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toutiao/1138561/2015-3-22/cd_19876168.html.

[15] 刘擎. 西方现代思想讲义[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21.

[16]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17] 赵梦梦, 李卫朝. 新时代中国农民道德人格塑造——以孟子之“诚”为合理内核的思考[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18] 李卫朝. 农民道德启蒙与乡村治理——以义利观、理欲观变革为中心的考察[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19] 胡百精, 杨奕. 公共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传播学范式创新[J]. 国际新闻界, 2016(3).

[2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22] 李少惠, 崔吉磊. 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生机制的构建[M]. 经济体制改革, 2007(5).

[23]牛耀红.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8(5).

[24]王宇雄.落后农村治理中的离散化问题[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25]放大信用建设先行优势 开辟乡村振兴全新路径[EB/OL].(2021-04-29)[2021-07-03].http://www.rongcheng.gov.cn/art/2021/4/29/art_40743_2587541.html.

[26]龚廷泰.以社会治理创新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EB/OL].(2020-04-07)[2021-07-03].[http://xhv5.](http://xhv5.xhby.net/mp3/pc/c/202004/07/c761632.html)

xhby.net/mp3/pc/c/202004/07/c761632.html.

[27]虞崇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治”关系逻辑[J].东南学术,2020(2).

[28]《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

[29]张远娜,毕明.基于信用体系建设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山东省荣成市的实践探索与启示[J].宁夏党校学报,2020(1).

Credit Score, a New Honesty-oriented Model of Rur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Though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n Rongcheng City

ZHOU Haining, ZHANG He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l of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human-based pos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with the credit score system as the core embodies the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ng up and down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it embodies the featur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virtue and autonomy in the modern wa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rural credit score system has stimulated the goodness of the public and enhance the happiness sense of the people, and it is a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 with the goal of good system and good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credit system; good governance; honesty

(责任编辑 陇 右)